

1923年日本大地震后 谣言致朝鲜人和华工遭屠杀

1923年的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一些不负责任的日本报纸,竟然发布“富士火山将大喷发”、“东京地区正在沉入海底”等不实消息,让从废墟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更加惊恐。东京市内交通、水电供应严重破坏,谣言四起,一片混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捏造并散布谣言,称“朝鲜人触犯神灵,地震是天神的惩罚”,军警当局还诬指社会主义者和旅日朝鲜侨民纵火、投毒,授意右翼团体自警团恣意刑讯、屠杀。



▲1923年日本大地震后,东京市区景象。(资料图)



▲1923年9月,中国首次向日本派遣地震救援队。(资料图)



►王希天 (资料图)

中国积极援助日本灾民

1923年9月1日上午11点58分至12点03分,一场大地震袭击了日本关东地区。震中位于东京的相模湾内,震级为7.9级。大地震引发了火灾、海啸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东京、神奈川、千叶、埼玉、静冈、山梨、茨城等1府6县成为地震灾区。

由于地震发生时正值中午,很多人家在做午饭,倾倒的炉火引发了100多处起火点,其中大部分没能被扑灭,再加上日本当时的房屋多以木结构为主,火势迅速在各地蔓延开来。尤其是在东京和横滨两个大城市,火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东京的大火持续燃烧了3天,街道、建筑大部分被烧毁。火灾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现在东京墨田区的横纲公园,当时这里是一片约6.6万平方米的空地,聚集了很多无家可归的避难者,不幸的是这里也被大火袭击,约3.8万人被烧死或窒息而死。横滨也化为一派火海,当时华人集中的南京街有5000多名在日中国人,结果约有2000人因地震和火灾死亡。在这次地震中死亡、失踪人数合计约为10.5万人。房

屋损毁10.9万余间,严重损坏10.2万余间,烧毁21.2万余间。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积极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的北洋政府组织赈灾救济委员会,并支出库银20万元(当时1元钱能买40斤大米)用于救灾,还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各界名人也纷纷捐款,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还组织了赈灾义演。在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一些地方也都有自发的募捐活动。9月6日,上海总商会、红十字会等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到9月27日,该会共捐助钱粮、药品计14万元。中国佛教界也组织了赈灾活动,各大寺院道场组织各种法会,吊祭日本地震的罹难者。地震发生后,日本共收到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40多个国家的救援物资和资金。

谣言称朝鲜人趁乱纵火

大地震使东京、横滨等地的电力、水力、交通、通讯等系统完全瘫痪。由于交通、通讯的断绝,无法传递准确的情报,政府一时间也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救援。大地震不仅摧毁了人们的肉体,也

几乎摧毁了人们的精神,幸存下来的人惊魂未定。

这时,各种谣言开始在灾民间传播。据日本警视厅的记录,谣言包括“还要爆发大地震,还有大海啸来袭,富士山将大喷发”等。在这种有关自然灾害将进一步加剧的谣言迅速传播的同时,从9月1日傍晚开始,出现了与政治相关的各种谣言,在市民中引起了更大的恐慌。谣言包括“在日本社会受虐待的朝鲜人要趁地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反击日本人”、“地震中从监狱逃出来的罪犯要发起暴动,对现实不满的社会主义者趁乱进行暗中活动”等。在这些谣言中,与朝鲜人有关的谣言尤其为人们所深信。而且谣言越传越玄,开始时说“朝鲜人要趁地震的混乱放火”,过了一夜就说“朝鲜人抢劫、强奸、杀人、朝水井投毒”等,后来甚至出现了“朝鲜人在伊豆大岛装了炸弹而引起了地震”等说法。很多人开始相信朝鲜人要趁机会发生暴动,并认为火灾的扩大也是由于朝鲜人的暗中活动造成的。

当时的日本人会相信这些谣言,与当时他们对朝鲜人的认知不无关系。日本1910年正式吞并了朝鲜,并在朝鲜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利用“土地调查”等手段掠夺朝鲜土地。很多流离失所的

朝鲜人被迫到日本做工,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在日本的朝鲜人也成立了一些组织,参加日本工人运动,1921年至1922年,先后成立了东京朝鲜劳动同盟会及大阪朝鲜劳动同盟会,192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也有在日朝鲜人参加。日本当局也据此认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日本媒体的宣传也极力丑化朝鲜人,认为他们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因此很多日本人对谣言深信不疑。

那么,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有日本学者怀疑,是日本政府为转移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的愤怒而制造的,并任其散布;也有学者主张是在民间自然形成,一部分官员相信了这些谣言,并以此为依据加强了戒备。确实,今天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已经很难了。另外,遇害朝鲜人和华工的具体人数是多少?责任是否在日本政府?这些问题也有待历史学者继续研究。

朝鲜人和华工成屠杀对象

9月2日下午,日本政府通过紧急命令发布了戒严令,出动军队维持社会秩序。同一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局长发电报给各地方长官,电文如下:“利用东京附近发生震灾之机,朝鲜人在各地放火……现已在东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各地要严密巡查,严格取缔朝鲜人的活动。”3日上午,又向全国发送了“朝鲜人在各地放火,欲达到其不逞之目的”的电报,同时戒严地区扩大到整个东京府和神奈川县。颁布戒严令意味着进入非常时期,由军队掌控一切,一般情况下是在战争和内乱爆发时颁布。这次颁布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不逞之举,保护罹灾者”。据此,军队和警察开始大肆逮捕、屠杀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号召市民提高警惕,各地也组织了以在乡军人会(退伍)或青年团(地方青年组织)为主体的所谓“自卫团”,用日本刀及竹枪等武装起来,四处奔走“猎捕朝鲜人”,一旦发现,或将其杀害,或在施暴后将其交给警察或军队,手段极其残忍。虽然不久之后人们得知有关朝鲜人暴动等消息只是谣言,警察厅也制定了自卫团规则,要求停止对朝鲜人的迫害,但这时被军队、警察、自卫团所杀死的朝鲜人已达数千人。有史料称,当时有6000多名朝鲜人在屠杀中丧生。

在屠杀朝鲜人的同时,他们还把屠刀伸向了在日华工(有一说称他们被误以为朝鲜人)。据不完全统计,有700多名中国人(90%是温州人)遇害。东京大岛町8丁目是华工的一个聚居地,9月3日就有近200名华工在这里惨遭杀害。据当时住在8丁目146号的木户四郎(当时27岁)回忆:“五六名士兵和多名警官及很多民众,包围了约200名中国人,民众都手持斧头、铁钩、竹枪、日本刀等,从一侧屠杀中国人,中川水上署的巡查等也和民众一起,像疯了一样实施屠杀,其间还有两声枪响,可能是射杀逃亡者吧。我当时都不敢正视自己同胞的残虐行为。”此外,横滨等华人聚居区也发生了屠杀事件。在日本的中国工人领袖王希天9日上午前往大岛町慰问受难华工,途中也被军警秘密拘捕,12日凌晨被秘密杀害。之后此事一直被封锁,直到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久保野茂次日记》,人们才了解真相。

日当局借机杀害异见人士

在残酷杀害朝中劳工的同时,军队和警察从9月3日开始,也对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及工人运动领袖等进行镇压。

地震后产生的谣言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者借机暗中行动”。日本当局最担忧他们鼓动群众发难,日本宪兵队正好借此机会拔掉“眼中钉”。9月16日,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等冲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核心人物大杉荣的家,强行将大杉荣夫妇及其外甥带到宪兵队,掐死了他们,并将尸体投入井中以毁灭证据。这件事在9月20日被《时事新报》与《读卖新闻》发现,12月甘粕正彦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但1926年10月即获得释放,并由陆军出资送往法国留学。

关东大地震后外国强烈谴责日本屠杀大批朝鲜人,对此日本官方避重就轻,百般辩解,不承认屠杀罪行。

日本屠杀中国劳工的消息很快传回中国,引起中国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怒,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王希天被害后,北洋政府也曾派出调查组赴日调查。但由于日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以及当时北洋政府的无能,最终无果而终。

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一战时日本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但战后发展经济的各种有利条件消失,经济发展减慢。关东大地震引发了震灾经济危机,自此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危机和慢性萧条状态。在政治上,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打击力度,再加上当年12月27日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刺杀摄政的裕仁亲王未遂的事件,更加重了市民对社会主义者的恐惧心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增强。

日本政府痛定思痛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痛定思痛,提高了建筑的抗震能力,加强了对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视。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日本的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汶川特大地震后,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来到四川灾区抢救受灾民众,其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让人钦佩,值得赞扬。

不过,日本对屠杀朝鲜人和华工的反省则到日本二战惨败之后才开始。

在日本东京的横纲公园,竖立着一座“追悼关东地震朝鲜人牺牲者碑”。此外,在神奈川等地也有类似的慰灵碑。自1983年开始,每年9月,在日朝鲜人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在中国,1924年归国的温州留学生集资在温州华盖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纪念碑。抗战期间,此碑在温州沦陷后,被日寇拆除,这一事件也逐渐被人们淡忘。

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详细调查,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遭屠杀》、《大地震时对中国人民遭屠杀——中国工人和王希天为何被杀》等书,使人们能通过事实了解事件真相。

1993年9月关东大地震70周年纪念日,日本友好人士捐资,在温州重建了“王希天烈士暨温州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

(摘自《青年参考》,作者张艳茹)